

茨威格人物传记  
STEFAN ZWEIG



E

IN GEWISSEN GEGEN DIE GEWALT ODER CASTELLIO GEGEN CALVIN

# 良知对抗暴力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茨威格人物传记

EIN GEWISSEN GEGEN DIE GEWALT ODER CASTELLIO GEGEN CALVIN



# 良知对抗暴力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良知对抗暴力: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奥)茨威格(Zweig,S.)著;  
舒昌善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3

(茨威格人物传记)

ISBN 978-7-108-03838-8

I. ①良… II. ①茨… ②舒… III. ①卡斯特里奥, S. (1515~  
1563) — 生平事迹 ②加尔文, J. (1509~1564) — 生平事迹  
IV. ①B979.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5279号

责任编辑 张琳

封扉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图 字 01—2010—704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2年3月北京第1版

201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1.375

字 数 271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29.80元

后世将无法理解，我们在世界出现过曙光之后还会再度  
不得不生活在像辛梅里安人似的无尽黑暗之中。<sup>〔1〕</sup>

——卡斯特里奥，1562 年

---

〔1〕 此语见卡斯特里奥的著作《论怀疑之道》。希腊神话中的辛梅里安人（Cimmerian）永远生活在黑暗中。

# 目录

第一章	引言 .....	1
第二章	加尔文攫取权力 .....	16
第三章	“教会纪律” .....	40
第四章	卡斯特里奥登场 .....	68
第五章	塞尔维特案件 .....	93
第六章	火刑处死塞尔维特 .....	116
第七章	宽容宣言 .....	139
第八章	良知斥责暴力 .....	167
第九章	暴力扼杀良知 .....	189
第十章	共同的归宿 .....	225
茨威格附记 .....		241
本书大事年表和重要注释 .....		245
译者后记 .....		335

# 第一章 引言

他身处险境而依然顽强勇敢，他面对死亡危险的临近而依然镇定自若，他在自己的生命被杀戮时依然用毫无畏惧和轻蔑的目光注视敌人，他不是被我们人的同类而是被命运所击倒。他被杀害了但没有被战胜。最勇敢的人有时最悲惨。所以说，令人赞叹的失败足可与胜利媲美。<sup>〔1〕</sup>

——蒙田

“蚊子对抗大象”——这是卡斯特里奥<sup>〔2〕</sup>亲笔添加在他撰写的那一册《驳加尔文书》<sup>〔3〕</sup>在巴塞尔流传的原稿手抄本上的一句话。这句话首先会使人感到纳闷，而且容易被人臆想为，这无非是一些人文主义者的过甚其词罢了。其实不然，卡斯特里奥的话既不夸张也不是自我调侃。勇敢的卡斯特里奥只是想要用这样一个非常浅显的比喻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的朋友阿梅巴

---

〔1〕 此语见蒙田随笔《话说食人部落》篇。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文艺复兴后期法国著名散文家，有《随笔集》三卷传世，其思想内容和文体风格对后世均有深远影响。

〔2〕 卡斯特里奥生平，参阅《本书大事年表和重要注释》（以下简称《大事年表》）1515年记事〔1〕。

〔3〕 卡斯特里奥于1554年完成《驳加尔文书》，但生前未能出版，只有原稿手抄本在巴塞尔流传。参阅《大事年表》1554年记事〔7〕。

克<sup>[1]</sup>，他自己心里是多么明白，而且是满怀悲情地明白：当他——卡斯特里奥公开指责加尔文出于发疯似的固执己见而杀害一个人，从而也就扼杀了宗教改革所宣扬的良知的自由时，他是在向一个何等强大的对手挑战。自从卡斯特里奥像举起长矛似的举起自己的笔投入这场危险的论战的最初时刻起，他就全然明白：为反对武装到牙齿的专制独裁的绝对优势而进行的任何一种纯粹思想上的斗争都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因而这样一种大胆行为必败无疑。在加尔文的背后有成千上万人的支持，有各种拥有武装的国家暴力机构的支持；而一个孤立无援、手无寸铁的人又怎么可能和这样一个加尔文进行争斗和战胜他呢！加尔文依靠自己出众的组织才能成功地将整座城市——拥有数以万计迄今仍然是自由市民的整个日内瓦城市国家——转变为一部死气沉沉的、由他操纵的机器；他成功地铲除了各种独立自主的行为——成功地剥夺了每个人的思想自由，以便有利于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教义。在日内瓦这个城市国家中，凡是拥有权力的一切——所有的官署和职权部门、行政公署<sup>[2]</sup>和教会纪律监督委员会<sup>[3]</sup>、大学和法院、国家财政机构和道德教化机构、教士、学校、巡捕、监狱——以及见诸文字的一切思想和各种各样的言论，甚至窃窃私语的话，统统都在加尔文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控之中。他的教义已成为法律。谁胆敢对他的教义颇有微词，牢房、放逐或者火刑就会立刻教训此人，教训他的理由是任何一种思想专制的统治用来扼杀一切争论的强词夺理：在日内瓦

---

[1] 博尼法茨·阿梅巴克 (Bonifacius Amerbach, 1495—1562)，瑞士法学家、艺术品收藏家，伊拉斯谟遗嘱和遗产的执行人，卡斯特里奥的好友，经常在经济上帮助卡斯特里奥。

[2] 日内瓦行政公署是日内瓦政府。参阅《大事年表》1527年记事〔3〕。

[3] 加尔文于1542年在日内瓦建立教会纪律监督委员会（法语 *consistoire*），参阅《大事年表》1542年记事〔1〕。

只容许一种真理存在，而这种真理的先知就是加尔文。然而，这样一个令人畏惧的人物所拥有的巨大权力还竟然会越过日内瓦的城墙到达远方呢：瑞士联邦各城市都将加尔文视为是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者；新教世界将这个诉诸暴力的基督教徒奉为自己的精神领袖；侯爵们和国王们想方设法要博得这样一位在欧洲建立了除罗马天主教会外最强大的基督教组织的教会领袖的好感。不再有任何时事政治事件会在 he 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也几乎不会发生任何违背他的意愿的时事政治事件，因为敌视加尔文——这位圣·皮埃尔教堂的布道师<sup>〔1〕</sup>已变得完全如同敌视皇帝或者罗马教皇一样危险。

而他的对手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居然想以人类思想自由的名义向这么一个实行思想专制的统治者进行论战，那么，这样一个孑然一身的理想主义者卡斯特里奥又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确实，和加尔文的难以想象的巨大权势相比，那还真是蚊子对抗大象呢！就对公众的影响而言，卡斯特里奥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影响微乎其微，而且他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是一个穷得像乞丐似的学者，靠译书和当家庭教师勉强养活妻小<sup>〔2〕</sup>，他是一个在异国他乡没有居住权和公民权的难民，一个双重的流亡者<sup>〔3〕</sup>。这个崇尚人性的人其实是既无权又无势，他在狂热的争论不休的信徒们中间完全孤立——在人们陷入盲目的狂热信仰的一切时代都是这种情况。这位谦卑而又了不起的人文主义者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迫害和穷困的双重阴影之中，过着一种最最清贫的生活。他永远窘迫，但也永远自由，因为他既不和任何宗派有联系，也不痴迷于信仰的狂热。只是当他感到自己的良知已被塞尔维特之死疾声呼唤，从而放下自己安安静静的

---

〔1〕 1536年9月5日，加尔文在日内瓦被任命为布道师。

〔2〕 卡斯特里奥一生结婚两次，有子女九个。参阅《大事年表》1542年记事〔2〕。

〔3〕 卡斯特里奥先从法国流亡到日内瓦，又从日内瓦流亡到巴塞尔，故称双重流亡者。



工作挺身而出，以已经被玷辱的人权的名义谴责加尔文的时候，他的这样一种寂寞生活才渐渐演变为以后英雄般的人生。因为卡斯特里奥不像他的惯于斗争的对手加尔文那样，周围有一群按照计划组织起来的、抱成团的铁杆追随者可以掩护自己；没有任何宗派——既没有天主教的宗派也没有新教的宗派——会向卡斯特里奥提供任何援助；他也没有任何高贵的君主——没有哪个皇帝和哪个国王——会像先前庇护马丁·路德<sup>[1]</sup>和伊拉斯谟<sup>[2]</sup>那样来庇护他，就连那些钦佩他的少数几个朋友也只敢在暗用窃窃私语鼓励他的勇气。因为持有异见者在所有的国家被时代的疯狂视为如同驮物的牲口一样受折磨和受驱使的时候，一个毫无畏惧的人要为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和被奴役的人仗义执言，并要通过塞尔维特被害这样的个别案例去彻底否定世界上一切当权者所拥有的这样的权力；仅仅由于世界观的缘故而去迫害同一个世界上的另一个人。这时候他是公开站在那个受迫害者的一边呀，那可是非常非常危险！那可是一种性命攸关的危险！各族人民有时会遇上使人的心灵变得非常阴暗的可怕时刻，卡斯特里奥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保持着自己清醒和充满人性的洞察力，而且敢于将各种假借虔诚敬畏天主的名义所进行的杀生献祭一针见血地称之为谋杀！名副其实的谋杀！卡斯特里奥是唯一不愿意再忍受沉默的人，也是唯一大声说出自己对各种非人性的行为深感绝望的人。他怀着深厚的人性情挑战自己：他要独自一人自己赞成与反对的一切而斗争。因为谁在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永远无法摆脱胆怯懦弱的时候敢于指责当时的当权者和权力分享者，谁就始终很难指望会有自己的支持者。所以，塞巴斯蒂

---

[1] 参阅《大事年表》1521年记事〔2〕。

[2] 参阅《大事年表》1469年记事。

安·卡斯特里奥在关键性的时刻身背后除了自己的影子以外没有任何人。这样一位搏击奋斗的文人唯一拥有的是无法变卖的精神财富：无所畏惧的心灵中一种不屈不挠的良知——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话又说回来，恰恰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从一开始就预先知道自己的斗争毫无成功的希望，然而他依然听从良知的呼唤去进行这场斗争——恰恰是这种神圣的“然而”和“尽管如此”使这个在人类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中的“无名小卒”永远被赞誉为英雄；在每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看来，仅凭这样一种敢于孑然一身向实行恐怖统治的世界提出强烈抗议的无与伦比的勇气，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的论战就已值得人们世代缅怀。不过，这样一种历史性的辩论就其提出的实质性问题而言，远远超越时代的诱因。因为这场辩论所涉及的并不是狭隘的神学理论——并不是塞尔维特一个人的神学观点，更不是区别自由派的新教教义和正统派的新教教义之间不同的关键性症结。在这场双方相持不下的争论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内涵广泛得多的问题——一个超越时代的问题：即要拷问我们自己的灵魂<sup>〔1〕</sup>。这一次争论是一场斗争——它固然由卡斯特里奥拉开序幕，但它必将会以其他的名义和其他的形式继续进行到底。神学在这场斗争中无非是一种凑巧的时代面具罢了，即便是卡斯特里奥和加尔文也只不过是作为一种看不见而又无法克服的对立双方的两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而已。不管我们如何称呼这样一种始终紧张对立的两极：称呼为宽容与不宽容，或者称呼为自由与管束，人性与狂热，个性与划一，良知与暴力——其实都无所谓。所有这些称呼无非是要表达一种最内心、最个人的最后抉择：在每个人的心目中是人道宽厚更为重要呢还是政治性的事情更重要，是通

---

〔1〕 茨威格在此处引用拉丁语原文：nostra res agitur。

情达理更为重要呢还是拘泥于刻板的条条框框更重要，是自己的人格更为重要呢还是趋炎附势更重要。

这样一种必须一再在自由和权威之间划清的界限，对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正在思索的人来说都必不可少，因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自由——否则，自由就会成为一片混乱；同样，没有自由也不可能有权威——否则，权威就会成为暴政。毫无疑问，在人的本性中深埋着一种神秘的渴求：希望自己能融入社会；但与此同时，人类最原始的梦想在我们心中始终未能泯灭：梦想能够找到最终会极其公正地将和平与秩序赐予人类所有成员的某种宗教制度、某种国家制度或者说某种社会制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宗教裁判所大裁判官<sup>〔1〕</sup>以无情的雄辩证明了，人类的多数原来都害怕自身的自由。事实上，芸芸众生由于面临会使人精疲力竭的众多问题——面临生活的复杂性和责任性，出于深感厌倦而企盼世界变得有规有矩：企盼有一种普遍有效、不会更改和权威性的制度，省得他们自己去动脑筋。——芸芸众生企盼有一个救世主能解决人生的各种问题，而正是这种企盼成了一种真正的酵母：它为一切社会先知和宗教先知铺平了道路——每当一代人的理想失去热情和光辉时，一个具有诱惑力的人只需挺身而出并且断然声称，是他，而且唯独是他找到了或者说首创了新的救世之道，那么成千上万的人就会趋之若鹜，将自己的信任寄托在这个所谓民族的救星或者说世界的救星身上。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总会首先在世间创造出一种新的理想追求——这大概就是新的意识形态的深奥莫测的意义吧。因为每一个向世人许诺人类最原始的梦想——国家统一和政治

---

〔1〕 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俄罗斯著名作家，代表作品有《白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宗教裁判所大裁判官是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一人物形象。

清明——的欺世盗名者首先就会从世人身上得到最神圣的力量：献身的意愿和满腔热情。数以百万计的人就会像中了魔似的心甘情愿被压迫、被蹂躏、被宰割，而且这样一个欺世盗名者向世人要求越多，世人就会越痴迷于他。自由——昨天还是世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渴求，他们却可以为了取悦这个欺世盗名者而自愿将自由抛弃，只是为了更加俯首帖耳地服从他的领导，而塔西佗那句古老名言——“我们陷于被奴役的状态”<sup>〔1〕</sup>就会一再得以实现，以致各族人民陶醉在充满激情的团结之中而自愿陷于被奴役的状态，同时还要赞美抽打在他们身上的皮鞭呢。

一种思想意识——世间最最非物质的力量竟然会在我们这个静谧安详和循规蹈矩的古老世界上一再创造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蛊惑世人的奇迹：世人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蛊惑——他们钦佩并且赞美那些欺世盗名者，因为欺世盗名者们成功地将精神转化为没有思想的物质。然而，恰恰是这些宣扬理想或者说宣扬空想的人一旦取得胜利之后就几乎全都会立刻暴露出自己是他们所鼓吹的那种精神的最最卑劣的背叛者——而其后果则是带来无穷的灾难。因为权力会膨胀成为绝对权威，胜利会膨胀成为滥用胜利。那些征服者们并不满足于自己曾激励过许多人为了他们个人的虚无缥缈的理想而乐于去生和去死，那些征服者们全都会陷入这样一种诱惑：要将征服多数人转变为征服全体民众，并且还要将自己的教条强加给那些没有宗派的人士。那些征服者们并不满足于有自己的驯服工具——他们有自己的附庸、有自己的精神走卒，他们并不满足于自己有那些有历次运动中永远为他们冲锋陷阵的人——不，他们并不满足。他们还

---

〔1〕 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公元55—约120），古罗马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曾任执政官，倾向共和，反对帝制。主要著作有《编年史》、《历史》等。“我们陷于被奴役的状态”（*ruere in servitium*）是《编年史》第一卷中的名言。

要使那些自由的人——那些少数有独立思想的人渐渐成为替他们歌功颂德的人和奴仆呢，并且为了将自己的教条作为独一无二的信仰加以贯彻，他们会以国家的名义将任何不同的意见斥之为犯罪。一切宗教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意识形态都永远重复着这样的厄运：一旦这些意识形态转变为专制，这些意识形态就会酿成暴政。而当一个人欺世盗名者不再相信自己的“真理”具有内在的威力而需要采取残忍的暴力时，他就会向每个人天赋的自由宣战。任何一种思想意识——不管哪一种思想意识都一样——从它为了整肃和控制各种异己的信念而采取恐怖手段的那一刻起，它就已不再是理想的追求了，而是罪恶的渊藪。即便是最最纯洁的真理一旦要用暴力去强迫别人接受，它也就亵渎了其自身精神。

思想界确实无比神奇。它似乎像空气一样看不见和摸不着，可以作任意的改变，顺从地适应各种情况和各种模式。而正是这一点往往会一再引诱生性专横的人产生这样的错觉：他们完全能够压制思想界、禁锢思想界、随自己的心愿堵住思想界的嘴。可是，就像力学上的作用与反作用一样，随着任何一种压迫的增强，反抗也会增强——而且恰恰在反抗被压迫到了极点时，反抗就会成为炸药，就会爆炸：任何一种压迫迟早会导致造反。因为人类在道德精神上的独立性从来无法被摧毁——这一点倒是永远令人欣慰！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能成功地用专制的手段强迫整个世界只信奉一种宗教和只信奉一种哲学——世界观的一种形式，而且今后也永远不会成功，因为思想界始终知道，为了抵御任何一种奴役，思想界要始终拒绝用规定的模式思维，拒绝让思想界自己变得浅薄、停滞、厌倦、鼠目寸光和唯唯诺诺。因此想要把生活中神奇的丰富多彩简单地划分为非黑即白的任何一种努力该有多么迂腐和枉然！——这种仅仅依靠强权贯彻的原则将人类划分为好人和坏人、敬畏天主的人

和异教徒、听命于国家的人和敌视国家的人。然而，为了反抗这样一种用暴力压制个人自由的行为，有独立思想的人随时都会出现，他们坚决拒绝违心地服兵役参加战争<sup>[1]</sup>。一个时代还不可能如此野蛮吧，一种暴政还不可能如此组织严密吧，以致始终没有个别的人会明白：应该避免对民众进行压迫；应该捍卫个人信念的权利；应该反抗那些声称为维护自己的“唯一真理”而使用暴力的偏执狂人们。

尽管 16 世纪和我们今天的 20 世纪十分相似——在意识形态方面采用暴力而杀一儆百；但在 16 世纪也曾有过思想自由和刚正不阿的人呀。如果我们读一读当年人文主义者们的书信，我们会亲切地感觉到他们对由于暴力而变得惊慌失措的世界所怀的深深忧伤。16 世纪的每一个基督教教义卫道士都会这么宣告：“凡是我们教导的，都是真的；凡是我们不教导的，都是假的。”而当年的人文主义者却十分厌恶这些像小贩兜售货物似的愚蠢宣告。——我们对他们的厌恶心情深有同感。是呀，面对那些自以为已进入到自己完美信仰的世界并且唾沫四溅地宣称要为正统的教义采取暴力的人，这些人文主义者——开明的世界公民们又怎么会觉得非常可怕呢！面对那些萨伏那洛拉<sup>[2]</sup>的信徒、加尔文的信徒、约翰·诺克斯的信徒——那些要扼杀世上美好事物并要把世界转变为道德课堂的人<sup>[3]</sup>——这些人文主义者又怎么会非常反感呢！所有这些充满人性和智慧的人以悲观的敏锐目光认识到：那些疯狂的刚愎自用的人必然会给欧洲带来灾难。这些人文主义者已经听到：

---

[1] 茨威格在此处引用拉丁语原文：conscientious objectors，意谓“出于良知的反抗者”，是指那些出于道德或宗教原因拒绝服役参加战争的人。

[2] 萨伏那洛拉生平简介，参阅《大事年表》1452 年记事。

[3] 萨伏那洛拉、加尔文、诺克斯均为宗教改革的领袖，他们固然坚决反对旧的天主教会的腐败、抨击教士和富人的骄奢淫逸，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奉行苦行主义，这显然违背人文主义思想，因而令人文主义者反感。

在激烈的言辞后面是武器在铿锵作响，并且预感到一场复仇战争——可怕的战争正在逼近。然而这些人文主义者们纵然知道真理，却不敢为真理而战。人生的命运几乎总是不能两全其美：明白道理的人并不是诉诸行动的人，而诉诸行动的人却并不是明白道理的人。这些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者们虽然互通令人感动和春秋笔法的书信，但他们仅仅是在自己关起门来的书斋里哀叹，并没有一个人文主义者挺身而出，与“反基督分子”<sup>〔1〕</sup>进行斗争。伊拉斯谟有时还敢于从暗处向他们射出几支冷箭；拉伯雷<sup>〔2〕</sup>会披着小丑的外衣用嬉笑怒骂进行鞭答。高贵而睿智的哲人蒙田<sup>〔3〕</sup>会在自己的随笔中写出最最意味深长的话；但是没有一个人文主义者试图认真地进行干预，哪怕是想方设法在无数可耻的迫害和处死中去阻止唯一的一次罪行也行啊！这些深谙人情世故的人文主义者们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明智的人不值当同疯狂的人争斗，因而他们变得十分小心谨慎。他们在那样的时代都会隐退到暗处，以免自己被抓住和牺牲。

然而，在所有这些人文主义者中间唯独卡斯特里奥敢于毅然决然挺身而出迎向自己的命运——这正是他的永世长存的荣耀。他英雄般地敢于为受迫害的同志们说话——从而也是为自己的一生遭遇说话。虽然他每时每刻都会受到狂热分子的威胁，但他自己却完全没有狂热的情绪，丝毫不激动，而是以一种托尔斯泰式的坚毅<sup>〔4〕</sup>表明自己的信念：不可以强迫任何人接受一种世界观；世间任何一种世俗政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用暴力去控制一个

---

〔1〕 此处原文是 Antichrist，指基督教《圣经》所称在世上传布罪恶终将在救世主基督复临之前被救世主灭绝的基督大敌——反对基督（教）者或不信基督（教）者。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指责教皇本人及其他天主教的主教们是“反基督分子”。

〔2〕 “披着小丑外衣的拉伯雷”，参阅《大事年表》1553年记事〔15〕。

〔3〕 “高贵的哲人蒙田”，参阅《大事年表》1533年记事〔1〕。

〔4〕 “托尔斯泰式的坚毅”，参阅《大事年表》1828年记事。

人的良知——这犹如在那个怒气冲冲的时代竖立起一面旗帜；况且因为卡斯特里奥不是以一个宗派的名义而是出于永恒的人道精神阐述自己的信念，所以他的思想如同他的有些言论一样永远不会枯萎。这些符合普遍人性的思想——超越时代的思想，一旦经过一位文人的巧妙阐述，就会始终保持自己的影响；这种在世界上相通的信念始终会比攻击性和教条式的个别信念存在更久远。然而，首先是这位不会被人忘却的卡斯特里奥的史无前例和堪称楷模的勇气在道德意义上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因为当卡斯特里奥不顾世上所有神学家的非议，将被加尔文处死的塞尔维特称之为一个被无辜杀害的人的时候，当他针对加尔文的一切诡辩提出自己的不朽名言——“活活烧死一个人，绝非是捍卫教义，而是屠杀生灵”<sup>〔1〕</sup>的时候，当他——比洛克<sup>〔2〕</sup>、休谟<sup>〔3〕</sup>、伏尔泰<sup>〔4〕</sup>早得多，因而也比他们了不起得多——在自己的“宽容宣言”<sup>〔5〕</sup>中最终宣告“人人都有思想自由的权利”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当作自己的信念的抵押了。但是，人们千万不要试图把卡斯特里奥抗议通过审判处死塞尔维特一事同伏尔泰在卡拉斯案件<sup>〔6〕</sup>中和左拉<sup>〔7〕</sup>在德雷福斯案件<sup>〔8〕</sup>中提出的抗议相提并论——虽然伏尔泰和左拉两人的抗议要著名千百倍，但他们的抗议远远达不到卡斯特里奥所作所为的道德高度——因为在为卡拉斯进行斗争时，伏尔泰已生活在一个比较人道

---

〔1〕 这几句话是卡斯特里奥的著作《驳加尔文书》中的名言。

〔2〕 约翰·洛克生平简介，参阅《大事年表》1632年记事〔1〕。

〔3〕 大卫·休谟生平简介，参阅《大事年表》1711年记事。

〔4〕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法国启蒙运动领军人物。生平简介参阅《大事年表》1694年记事。

〔5〕 “宽容宣言”是指卡斯特里奥的著作《论异端分子》。

〔6〕 卡拉斯案件始末，参阅《大事年表》1762年记事。

〔7〕 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 1840—1902），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参阅《大事年表》1840年记事。

〔8〕 德雷福斯案件始末，参阅《大事年表》1894年记事。



的世纪；此外，这位世界著名的文豪背后还有国王和侯爵的庇护呢；同样，爱弥尔·左拉背后有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敬仰——这犹如在他周围聚集着一支看不见的军队。伏尔泰和左拉两人敢于为一个不相识的人的命运采取救援行动，是要拿自己的许多声誉和安逸去冒风险的，但是不用像卡斯特里奥那样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风险——这始终是关键性的区别。卡斯特里奥在为争取人性而与整个残暴的恶势力进行斗争时要遭受他的那个世纪的一切非人道的对待。

卡斯特里奥为自己道义上的英雄行为付出了殚精竭虑的代价。这位只愿意使用思想武器而不愿意使用其他武器的非暴力主义者却令人震惊地被残忍的暴力挫败了——是呀，人们会一再觉察到，当单独一个人除了道义上的正直以外，身后没有任何力量的支持而去对抗一个严密的组织，他的斗争是多么没有成功的希望呀！一旦一种教义或者一种学说成功地掌控了国家机器和所有的镇压工具时，这种教义或者学说就会毫无顾忌地实行恐怖统治。谁怀疑它的绝对权力，谁的言论自由就会被剥夺，甚至他的喉咙也会被掐断。加尔文从未认真地回答过卡斯特里奥的问题。他更愿意堵住卡斯特里奥的嘴——撕碎、禁止、焚毁、没收卡斯特里奥的著作。加尔文用政治讹诈迫使邻近的巴塞州对卡斯特里奥实施一项写作禁令<sup>〔1〕</sup>，这样，卡斯特里奥就几乎不再能够回答什么和更正什么了。而加尔文的附庸们倒可以大肆诽谤卡斯特里奥——不久，这就不再是一场斗争，而仅仅是对一个无法抵抗的人所进行的卑鄙蹂躏罢了，因为卡斯特里奥既不能说也不能写，他的文稿默默地躺在抽屉里，而加尔文却占据着印刷机和布道坛，占据着讲堂和教会代表会议，他拥有国家权力的全部机器并能冷酷无情地使之发挥作用。所以，卡斯特里奥每走一

---

〔1〕 参阅《大事年表》1515年记事〔1〕。